

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桑明旭

摘要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之注入内在动力,同时也需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而且具体化地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实践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是资本创新,为了榨取利润、缓解危机,资本会不断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消费、新产业、新空间、新文化,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从马克思到当代,全球生产力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依然是资本的创新逻辑。当今时代,面对社会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诸多新利润领域以及传统危机修复方式达至实体性生产资源极限,资本以主体性退缩为条件开启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实现从资源主导到创新主导的重大转变。基于马克思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视域,当代中国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国内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也要着眼中国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既要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也要在“与狼共舞”中防止资本的另类牵引。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创新、资本主体性衰退、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在本质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资本创新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5)06-0060-10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5ZXZD002)

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是当前理论界、学术界肩负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在这项重大课题的讨论中,我们之所以聚焦“因地制宜”这一关键词,并强调要将其放置马克思的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视域下加以审视,基于如下递进的理论逻辑:其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行稳致远,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其提供内在动力。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在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并非绝缘于全球现代化体系,因而当代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任务不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背景下展开,也在全球生产力演进的世界背景下展开。其三,从当前全球发展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依然是“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1](P48),对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分析在本质上依然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其四,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一方面,“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2],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激活这种生产要素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P587)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充分汲取、借鉴、利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构成当代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其创始人看来,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因其趋利避害本性所开启的创新本质性地关联在一起,资本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基于上述理论逻辑,当代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含义不仅指涉国内各地区根据自身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差异化

统筹化地推动生产力升级迭代,还指涉立足“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共同特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影响因素,在总体上处理好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建构与资本创新的辩证关系。后一种意义上的“因地制宜”,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

一、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具体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马克思系统阐发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构成他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前提以及与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旧唯物主义思想家、唯心主义思想家论战的理论工具,也构成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指导原则,是“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4](P591)。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上述文本阐发的生产力理论之所以是“总的结果”,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基本矛盾、演进趋势及其内在规律的总体揭示和一般概括;同样,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总的结果”,因而尽管这个“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P5)。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和过程时指认的情况来看,在一般意义上阐明生产力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4](P591),进而推进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更为具体的工作。可见,不论是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般原理与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的关系来看,还是从马克思阐明生产力理论与其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来看,我们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理解、把握和运用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层面,而是要将其具体化到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事实上,当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集中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P8)时,也就不仅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而是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使用“资本的生产力”概念了。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3](P444),劳动的社会性质向资本的社会性质转化、劳动的生产力向资本的生产力转化,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1](P232);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1](P305)。因此,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6](P340)。

客观地说,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业已形成的生产力,对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演变的原因分析着墨不多且相对零散,但这并不代表他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张和看法。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探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相关影响因素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5](P53)通过综合梳理、系统分析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原因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资本创新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中心线索,即资本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的主导因素。

关于资本创新,正如有论者概括指出的那样:“所谓资本创新,就是指资本为了摆脱危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地、拼命地发明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产品、新销售、新市场、新空间、新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发展。”^[7]早在撰写《雇佣劳动与资本》时,马克思就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资本创新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个资本家要想将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其资本,就必须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而降低自己商品价格的前提则是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压缩自己的生产成本,这又依赖于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采取更加细致的分工以及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性地改造机器,“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8](P737)。正是这种普遍性的竞争导致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周而复始地出现如下情

况:“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8](P737-738)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资本的增长、积累、积聚和分工的不断精细化、规模化以及新机器的采用与旧机器的改进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8](P737)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创新的内在本质及其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具体包括如下方面:其一,资本之所以会不断创新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其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使然,“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1](P305)。为了榨取更多利润,资本总会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剩余劳动,总会想方设法减少必要劳动,为此就必须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越发展,它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1](P304),“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9](P92)。其二,资本使用量的增加是资本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资本使用量的增加,就不会有资本创新,也就难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尽管资本增加其使用量的本质目的在于谋求更多利润,但客观结果却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1](P313)。其三,资本创新表现为发明新科学、采用新技术。从发生学角度看,“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与此同时,“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9](P94),也包括科学的向前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是资本创新的必然结果,但是科学本身还不是生产力,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生产力。资本推动科学发展的目的在于利用科学的技术性转化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不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率。科学的技术性转化的主要方式就是新机器的使用,在此意义上,“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9](P93)。其四,资本创新表现为扩大新规模。资本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又导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工具价值的增加,表现为工具在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这就必然要引起材料的增加”^[1](P351)。其五,资本创新表现为采取新管理。与资本创新相对应的生产力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剩余劳动的增加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另一方面表现为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在资本总量中占比的减少,而这与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管理模式的不不断革新密切相关。创新管理方式、优化管理模式是资本榨取更多利润的重要途径,因为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可以“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5](P471),并且对资本来说,“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无偿的”^[10](P295)。其六,资本创新表现为催生新消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新消费既是资本创新和生产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制约着资本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1](P388)。资本创新带来的新消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二是“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三是“生产出新的需要”^[1](P388)。其七,资本创新表现为开拓新产业。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必然“使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倍增”,进而“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并“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9](P173)。其八,资本创新表现为开辟新空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1](P521)。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会不断优化其生产和交换的空间形式,在扩大再生产的同时降低固定资本的投入和消耗,并采取“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P521)的方式来加快积累速度。其九,资本创新表现为创造新文化和新精神。资本创新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生产方面。“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10](P221),进而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作所谓的合理性辩护。其十,资本创新表现为生成新矛盾和新危机。资本在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新消费、新产业、新空间、新文化等方式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矛盾

和新危机。“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11](P390),因而“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也内在地“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11](P406)。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资本创新逻辑批判构成马克思审视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视域,这为我们当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但是,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当年关注和探讨的对象主要是大工业资本创新与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而对所谓“后工业资本”创新与生产力从传统到当代嬗变的关系的分析,尚难以充分涉及。因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一个极其重大的使命任务就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系统梳理从马克思到当代的资本创新史和生产力演进史,深度澄清资本创新和生产力从传统向当代转换的本质关系及其演进脉络。

二、从马克思到当代:全球生产力演进过程中的资本创新逻辑

毋庸置疑,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推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产力与西方语境中的“资本的生产力”有着本质区别。但正如前文所述,在根本意义上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开辟的生产力与规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生产力也有相似之处,进而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新质生产力与全球语境下生产力的当代形态也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宏观语境下剖析生产力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到今天的发展变化,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站在新的时代方位回望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可以发现,尽管那个时代的生产力不是静态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P36),但总体上说,它依然是一种传统生产力,即一种以传统机器大工业为标志、在全要素生产率中强调环境和资源主导而非创新主导的生产力。与之相比,当今时代全球生产力发展虽然在本质上依然由资本驱动,但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变化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动因上,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导形态。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产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而在当今时代,“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11](P66),虽然依旧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属于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即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规制着产业资本的发展方向。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影响要素中,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等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取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资源等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尽管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这种飞速发展依然建立在依靠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生产的基础之上,那时“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8](P158)。当今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规模等优势,之于其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虽然也不可忽视,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已远不如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等带来的影响那么直接和明显。三是在生产力的本质形式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取代了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的本质含义。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主要表现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14](P36)等,相较于前现代社会人类畏惧自然、崇拜自然的状态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在长远意义上,这种生产力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后果,进而严重制约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在今天,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日益集约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层面,更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冲突不断走向和谐共生的层面。

从马克思到当代,全球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变化是人们可以切实经验到的事实,因而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对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逐一罗列介绍。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任务在于,要对这种变化的本质原因及演进逻辑展开细致剖析和系统说明。“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2](P66),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判断,他们所指明的时代是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14](P32)。这意味着,当今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与资本创新逻辑之间依然具有

本质性关联,马克思以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为基本视域审视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事实的确如此,纵观全球生产力从传统到当代的演变可以发现,资本创新逻辑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其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方面,全球生产力从传统到当代的演进过程,深刻反映了资本力图最大化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及其在这种本性驱使下的不断创新。我们知道,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尽管剩余价值形成于生产领域,但其实现却离不开流通领域,只有通过交换这一“惊险的跳跃”^[9](P483),资本的一次完整积累才得以完成。这意味着,对资本增殖来说,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任何商品交换活动的开展都与人们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密不可分,“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11](P32)。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已经频繁爆发,但总体上看,那是一个从贫困落后、闭塞黑暗的中世纪走出不久的时代,人们的消费需求主要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主。因此,在那时,不论是第一部类的生产还是第二部类的生产,都主要围绕着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展开。但是,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并不是始终停滞不前的,随着资本的生产对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供给的不断扩大,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具体而言,从简单的温饱到相对舒适的衣食住行,客观反映了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到20世纪中期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变化。在这段时间内,资本一方面通过生产更高质量和更多类型的商品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变化,另一方面通过机器生产的普遍化以创造更多的剩余时间从而不断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关于此,正如马克思预示的那样,“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其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13](P188)。在这一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主要表现为物质产品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物质产品生产门类的不断拓展,而这又都集中体现在机器的普遍化使用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工具理性批判,对生产力的上述发展状况及其辩证效应进行了反思。从20世纪中期至今,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再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相较于以往在物质产品的质量和类型方面的需求的渐进式提升,这一次重大变化更加聚焦于消费需求结构的整体调整,即人们在继续注重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对包括闲暇生活、精神文化、优美环境在内的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11](P32),人们的消费需求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指挥棒和方向标,当人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上述变化时,闲暇生活的创造、文化产品的生产、优美环境的营造等也就构成了社会生产的重要形式,进而也就构成了资本增殖的重要领域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实现其增殖目标。

因此,相对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以大工业生产的初步展开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时期以大工业生产的普遍化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而言,当今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虽然总体上仍旧围绕以劳动力的极大提升来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发明新技术来节约生产成本、以创造新产业来拓展利润来源等方面展开,但其中出现的知识化、智能化、生态化、文化化等全方面革新却是前所未有的。基于资本价值增殖的本性及其在这种本性驱使下的不断创新,我们可以穿透各种经验表象,深刻认识和把握上述革新和变化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全球生产力从传统到当代的演进过程,深刻反映了资本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增殖条件和增殖危机而进行的不断创新。囿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生态环境危机、资本过剩危机,等等。面对这些危机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制约,资本采取的应对方式就是不断地创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P34)。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资本增殖的危机史,同时也是资本通过创新不断应对和缓解各种增殖困境的危机修复史。历史地审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暴力输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5](P821)。但是,通过暴力方式掠夺而来的资源和财富自身并不会带来资本的价值增殖,如果不能

将这些资源和财富纳入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和交换体系之中,那么它们反而会构成王权和贵族的私有财产从而对资本关系的发展形成压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资本开启了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以掠夺来的资源和财富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效率,进而获得了远超过既有资源和财富的更大利润。但是,持续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面对这种危机,资本固然可以采取“向河里倒牛奶”等方式来予以缓解,但这种“短期内消灭生产力”的危机缓解方式取得的效果毕竟是短暂和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开启的创新方式是商品输出,即通过开辟全球市场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过剩产品销售至其他国家或地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商品输出”进行了深刻描述,他们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41](P35)。为了更好地在全球进行商品输出,资本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商品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要不断克服空间和地理因素对商品输出的影响,进而交通运输能力的显著增强即“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41](P36)等也就构成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在商品输出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创新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变化虽然可以相对缓解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但对于一些主要的商品输出国家或地区而言,生态环境危机却愈发严重起来。为了缓解生态环境危机,资本开启了新的输出方式——资本输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1](P626)与过去那种将商品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来之后再销售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输出方式不同,资本输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将银行业和产业资本的生产方式直接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一创新调整不仅极大地减少了商品周转时间,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而且缓解了资本输出国的生态环境压力,其客观结果则是全球范围内生产力的整体发展。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积累阶段的“暴力输出”到自由竞争阶段的商品输出再到垄断时期的资本输出,这些重大改变和调整都十分清晰地体现着资本的创新逻辑及其导致的生产力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往,资本面对增殖环境变化而开启的创新,不论是从“暴力输出”转变为商品输出,还是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都是以地理型、物理性、实体性的空间和生态条件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资本的发展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相关危机的时候,它总是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作为危机修复或危机转移的条件。比如,在商品输出主导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英国是世界产业资本的中心,大规模生产导致英国出现了一些像伦敦一样的雾都,但是在资本输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英国将诸多产业资本转移到了后现代化国家,通过在后现代化国家建立新的工业城市而将这些雾都转型为清洁美丽的金融城市。这种以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为基础的资本创新,决定其所催生的生产力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因而在宽泛意义上也可以将这种天然地依赖于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的生产力称为传统生产力。

基于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全球范围内可以用于资本危机修复和危机转移的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是有限的,可以用于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同样是有限的,进而随着产业资本的生产方式布展至世界各地,传统的资本创新方式和传统生产力发展也就必然会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今时代,全球生态危机已经无法通过传统空间转移的方式来予以缓解和修复,便是这场危机的典型表现。面对这场危机,资本既没有像罗莎·卢森堡等人预判的那样,在其全球空间布展完成之后因缺少“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而快速走向崩溃^[45](P376),也没有像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分析的那样,在解决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矛盾冲突上束手无策^[46](P1),而是通过又一次重大创新重塑了其危机修复方式。这次重大创新表现在:一是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的使用方式得到极大改变,利用效率得到几十上百倍的提升;二是在实体性生产条件中,绿色、低碳、可再生、可循环的生产条件所占比重显著增加;三是在资本的空间生产中,虚拟空间或网络空间等新型空间形式所占比重不断扩

大;四是产业门类更加多元、产品种类更加多样,并且非物质性的产业和产品在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等等。简言之,相较于以往历次创新,资本这一轮创新的最大特点是其危机修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的严重依赖,这同时也构成当今时代的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质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代全球生产力理解为以创新为主导而非以实体性资源为主导的高科技生产力、智能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等各种生产力形态的综合集成。

三、从资本创新逻辑视角看当代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基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般本质及其具体化展开,基于全球生产力发展从马克思到当代的历史演进及其与资本创新的关系,我们认为,全面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问题上的“因地制宜”,需要在如下方面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

其一,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把握当代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问题上的“因地制宜”,既要立足于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要着眼于中国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习近平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7](P77)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这要求我们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来为之奠定坚实基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要求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根据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稳步推进。新质生产力代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未来方向,其在现实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是需要具体条件的,全然不顾现实条件具备与否就冒进式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即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当今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调整,其中,全球生产力发展从传统到当代的演变构成当今世界遭遇“百年变局”的本质原因。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综合考量中国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18],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异质于资本现代化道路的,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一切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和原则,人民而非资本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力量,才是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当代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立足于自身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特殊国情民情,在推动生产力不断跃升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诉诸资本创新。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和趋势不仅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有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共同特征,因而当代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吸收借鉴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并将这些积极因素“因地制宜”地纳入中国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中。

其二,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中把握当代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问题上的“因地制宜”,既要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也要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防止资本的另类牵引。资本既是生产要素更是生产关系,二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资本创新既体现为生产要素变革更体现为生产关系调整,二者也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2]基于此,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之于当代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启示意义展开为如下递进的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创新不仅会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产品、新销售、新市场、新产业、新空间,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也会导致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危机。当代中国在充分发挥资本创新之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提前预见、提前处理这些新问题、新矛盾、新危机,综合运用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将其消除在摇篮之中。二是资本创新不仅会推动生产要素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也会催生与资本本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会造就新型生产关系,也需要新型生产关系来予以引领和促进,在其中,关于资本创新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孕育和发展的关系问题,我们要给予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三是资本创新不仅会推动生产关系调整,也会推动其“唯灵论基础”变化,进而导致相关理论和意识形态变革。“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19]。在当代全球哲学社会科学谱系中,一系列执后现代之名的思想学说和理论思潮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影响甚大,其原因就在于资本的不断创新,“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20]。因此,面对当代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我们需要立足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视域来对之作出深度剖析和科学辨析;同样,当代中国在借助资本创新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时刻警惕资本创新可能会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其三,在资本创新与资本主体性^①演进的内在关系层面把握当代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问题上的“因地制宜”。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由于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因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要结合各地区实际状况做到“因地制宜”;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对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借鉴,而全球生产力发展在本质上又是与资本创新密切相关的,因而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也要基于资本创新逻辑的辩证效应做到“因地制宜”。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类型的“因地制宜”既不意味着国内有些地区可以始终不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对资本创新采取十分保守或全然拒斥的态度。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方向,当前国内一些地区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制约,暂时还不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但从长远来看,它们都会或快或慢地走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道路。对相关地区来说,切忌不能以“因地制宜”为借口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徘徊不前。我们在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尽管资本创新的现实效应是辩证的,并且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危机和矛盾,但从当今时代资本创新的内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来看,在遭遇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根本制约的“百年变局”背景下,资本面对增殖危机所开启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将决定性地意味着其主体性的不断衰落,“‘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是资本主体性发展的‘抛物线拐点’”^[21]。在过往,从“暴力输出”到商品输出再到资本输出,资本直接以牺牲他者的主体性为代价而开启的诸多创新都体现着其主体性的增强或提升,这种增强或提升随着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全部被纳入资本创新及其危机修复的体系之中而达到顶点;而当牺牲他者的主体性也无法缓解自身的危机和提升自身的主体性时,资本发展遭遇的困境也就不再是其造就的各种后果而是其自身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体性的退缩也就构成其继续创新和危机修复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11](P67),如不是有更多利润可以榨取或迫不得已,资本不会在其增殖过程中增加任何多余环节。很显然,当今时代,资本的增殖方式日益走向差异化、集约化、虚拟化,这较之于过往那种直接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为手段的增殖方式来说,尽管在形式上更加具有创新性,但其体现出的资本主体性却是相对弱化的。基于此,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判断,也可以更加准确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列宁作出上述判断100年之后郑重提出“当今

^①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P46)。作为一个“自动的主体”“过程的主体”“扩张着的主体”^[5](P180),资本所“建立起来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11](P464)。也就是说,在颠倒物化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取代人成为现实的主体,不仅工人的活动要受到资本的宰制,而且资本家也不过是“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5](P178)。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原因及其重大意义。

当今时代,资本创新导致的资本主体性衰退和弱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层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资本当代创新推动非物质性生产、可持续性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这意味着资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收敛起其反生态本性,从而在客观上相对缓解人与自然的冲突。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资本当代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文化消费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条件,而文化消费又以消费主体的收入状况、文化水平、闲暇时间等为前提,这就相应地要求提高消费群体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并相对缓解他们长期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疲劳工作状态,以便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消费文化产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9](P107-108),“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2](P120)。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层面。在传统产业资本作为资本主导形态的历史阶段,囿于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对生产资料的激烈争夺必然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丛林状态。正是因为看到了该历史阶段全球秩序或国际关系的本质,黑格尔对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调“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23](P386),“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23](P387)。全球秩序中的弱肉强食逻辑和丛林法则状态,是资本单一主体性逻辑在民族国家交往层面的体现。资本的当代创新,既是其遭遇全球实体性发展条件制约而不得不进行的自我调整,也在客观上造就了其发展的条件结构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强制掠夺到自主创新的转变。对全球发展来说,这一转变将极大地缓解各民族国家对实体性发展资源的激烈争夺,进而民族国家交往中的可持续性因素与和平性因素也将大幅增加。

总而言之,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资本开启的一系列创新将在根本意义上决定其主体性不断衰退,而在“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24](P940)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体性的衰退则深刻意味着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增强和共同体的公共性提升。正因如此,在当代中国“因地制宜”借助资本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谈虎色变,不能过于保守,而是要积极发挥自身的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在驾驭资本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资本创新,从而引领和推动全球新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项有益于推动人类社会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的世界历史性事业。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05-0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7] 任平.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学习与探索,2013,(3).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4]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 [16] 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8] 习近平.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日报，2023-02-08.
- [19] 吴晓明.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学术月刊，2006，(2).
- [20] 丰子义.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2005，(4).
- [21] 桑明旭. “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演进趋势与内在张力. 湖北社会科学，2021，(4).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Innovation Logic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ight of Actual Conditions"

Sang Mingxu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o steadily and sustainably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in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thereby injecting internal momentum while also draw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rom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Marx's productivity theory not only address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delves concretely into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modern society. In Marx's view, the dominant factor driving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y is capital innovation; to maximize profits and alleviate crises, capital will constantly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management models, consumption patterns, industries, space configurations, and cultural forms, thereby propelling productivity forward. From Marx's day to contemporary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productive forces has achieved qualitative leaps, with capital's innovative logic remaining the central thread throughout. Today, confronted with new profit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s in social demand, and with traditional crisis-mitigation methods reaching the limit of physical production resources, capital has initiated an unprecedented wave of innovation by retreating from its dominant role, which has driven a major shift in glob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from resource-drive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Marx's capital innovation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ight of actual condi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 but also focus on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and global trend; it necessitates fully harnessing the "civilized" aspects of capital while guarding against its perverse influences in the "dance with the wolf". Amid immense changes in the intertwin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s", the innovation of capital, the retreat of capital's subjectivity,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toward a genuine community, in essence, aligned along the same path.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logic of capital innov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 作者简介 桑明旭，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苏州 215123。

■ 责任编辑 涂文迁